

開發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

杜維明

近10年來，突出文化、重建傳統和轉化西學的共識和共信已相當流行。但我必須指出，從五四、抗戰、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啟蒙的意識形態和以功利現實宰制知識心靈的科學主義，早已成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思潮的追隨者皆深信不移的現代意識。在這現代西方的霸權論說中被犧牲的，正是突出文化、重建傳統和轉化西學的人文精神。

近10年，在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各種社團中已湧現了一種既有群體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內涵：一，不僅從經濟和政治，也從社會和文化來考慮中國問題，特別突出「文化研究」的價值；二，不再把「傳統」歸約為「封建遺毒」的貶辭，並且對極端西化論者唯恐不能把傳統像包袱或贅瘤般拋棄、鏟除，作出嚴厲的批評，重新體認傳統的源頭活水，以發掘傳統資源為文化事業的當務之急；三，對凸顯現代西方價值的啟蒙心態進行同情的認識和批判的解析；在不亢不卑的心境中介紹西學、又通過「本土化」的具體分疏對西歐和北美的各種方法進行判教式的評斷。

固然，商業大潮和以政權勢力的得失為準則的霸權論說正瀰漫「文化中國」的兩岸三地，企業、娛樂、政論和靈修的報章雜誌充斥文化市場。中文刊物中類似英日法德等文字的書評、影評、文藝評論和學術思潮數量極少，銷路極小。但在學術界具有上述三種人文精神特質的「自我意識」已逐漸成為在人文學與社會學科的範圍內、以及有人文和社會關懷的科技領域中的知識份子所共許。這已不是「一小撮」樂觀理想主義者的幻覺，而是顯而易見的普遍現象。

其實，不僅在學術界，而且在企業、媒體、娛樂和朝野政壇，這種突出文化、重建傳統和轉化西學的共識和共信也相當流行。暫且不問文化中國的文化自覺是否和所謂「亞洲文藝復興」以及「亞洲價值」有關；也不對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文中把儒教文化圈和回教世界相提並論（皆是在二十一世紀挑戰西方中心的強勢文明）作出回應。只需捫心自問，中國（應該也包括東亞）知識份子自從鴉片戰爭以來虔敬唯諾地向西方學習：從蘭學（借用日本的例子）到



中文大學高錕校長手持創刊號與編委、編輯室人員合影。左起前排：翁松燃、陳方正、高錕、劉青峰、王于漸，後排：吳江波、劉述先、周英雄、陳其南、金觀濤、林道群。

英學、法學、德學和美學，近40年還要加上蘇學，面向二十一世紀是否應有紮根於知己知彼的知識基礎上的創造轉化！？

我並不斷然反對因救亡壓倒了啟蒙，現在必須超越救亡的惶恐心態而致力於啟蒙補課的提法：我也能同情地了解因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份子過分強調功利現實而無法深入理解西學之長、現在正是全面認識當代西方文明的大好時機的觀點，但我必須指出，從五四、抗戰、到建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啟蒙的意識形態(包括自由、人權、科學和民主的價值)已根深蒂固地成為救亡的不二法門；而以功利現實宰制知識心靈的科學主義，也早已成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思潮的追隨者皆深信不移的現代意識。在這現代西方的霸權論說中被犧牲的，正是突出文化、再建傳統和轉化西學的人文精神。

文化中國人文精神的勃興當然可以從對西方啟蒙心態乃至批判啟蒙心態的後現代論說(如環保主義、女性主義、宗教多元主義、和以全球社群為對象的倫理思潮)中獲得豐富的資源，但如何平實地、深刻地、創建地、系統地來開發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藉以釐定我們當下的「文化傳統」的方向性，是值得大家共同深思的課題。在這個課題上有所突破，對文化中國的知識份子如何安身立命應有裨益。